

延安时期党的纪律建设

□ 何虎生 郭 澳

我们党是靠革命理想和铁的纪律组织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纪律严明是党的光荣传统和独特优势。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创了党的建设“伟大的工程”，增强了全党的党性，改进了党的作风，纯洁了党的肌体，厚植了党的群众基础，取得党的建设历史性成就。党在这一时期开展了党的纪律建设突破性实践，形成了党的纪律建设创新性理论，为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与现实启示。

延安时期，我们党以党的建设为统领，着力抓好党的纪律建设，不断完善纪律规矩，大大增强了党的凝聚力、战斗力。

一是以制度规范保障纪律建设。“路线是‘王道’，纪律是‘霸道’，这两者都不可少。”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首次提出了“党内法规”概念，通过了《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等重要党内法规，完整提出了民主集中制“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重要原则。1942年8月，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正式确立了党的一元化领导原则。党的七大高度重视制定和完善党的章程，七大纲章将党的纪律作为组织基础写入总纲，规定了党员均有遵守组织纪律的义务，确立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一党的纪律建设的重要原则。

二是以执纪从严推进纪律建设。执行纪律的严肃性直接关系到党的纪律的权威性。一方面，我们党及时清除分裂主义、宗派主义错误影响，将叛党反党的张国焘开除出党，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撤销长江局，克服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错误。另一方面，将道德败坏、蜕化变质的党员清除出党的队伍并严肃处理违纪犯法者。黄克功对陕北公学女学生刘茜逼婚未遂后持枪杀人，被边区高等法院判以死刑；肖玉璧贪污受贿、倒卖边区物资，亦被判处死刑；刘力功拒绝执行组织决定，在组织多次与其谈话后仍不服

从安排，被开除党籍。

三是以学习教育引领纪律建设。到1938年底，党员人数已经从全面抗战爆发时的4万多人增加到了50多万人。在大量发展党员的同时如何保证党员的质量，使全体党员能够在统一纪律下团结起来，成为党面临的紧迫问题。1941年7月，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强调“要在全党加强纪律的教育”，彰显了党加强自身建设的自觉。为了维护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内的领导地位，毛泽东主持编印了《六大以来》《六大以前》《两条路线》，这三部“党书”对历史上的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进行比较，使党的高级干部在学习中分清是非、更加团结。

延安时期，我们党探索出一条局部执政条件下解决自身问题、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成功道路，党的纪律建设走上系统化规范化的轨道，保障党领导的事业不断取得胜利。

党章党规越来越成为全体党员干部的总规矩，“铁的纪律”保证了党的行动上一致。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立下了许多重要的政治纪律，具有规范性和稳定性的党的纪律实质上具备了党内法规的性质，党更加注重依靠党内法规来规范和约束组织与个人的各种关系与活动。“党章就是党的根本大法，是全党必须遵循的总规矩。”作为党的历史上第一部完全独立自主制定通过的党章，七大纲章对纪律的阐述指明了党纪的重要性和执行纪律的严肃性，成为这一时期加强党的纪律建设的总依据和总遵循。我们党建构起以党章为纲领、以各项党内法规文本为支撑的基础性体系，为探索制度化、规范化的党内法规体系奠定了坚实基础。

极大地塑造了中国共产党的精神、气质和面貌。经过纪律教育，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宗派主义、分散主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和非马克思主义思想不断被清除，党内政治生态得到净化。具体来说，“三多三少”成为延安的标志性现象，即“讲个人要求的少了，服从组织分配的多了；图安逸比享受的人少了，要求到前线 and 艰苦地方锻炼的人多了；自由主义现象少了，严守纪律的人多了”。党内

良好的政治生态对塑造积极向上的社会风尚形成示范作用，陕甘宁边区“十个没有”的优良作风彰显了共产党人和边区群众团结奋进的精神风貌。

实现了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空前团结和统一。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破坏党的纪律，王明违反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这些党内一度存在的无纪律无领导状态让中国革命付出了惨痛代价。为了“使党铁一样地巩固起来”，在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过程中，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逐渐成为全党的思想共识和行动自觉。党的七大确定了党的政治路线，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延安时期，党的纪律建设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了重大突破，为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提供了有力保障，积累了丰富经验。

把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放在首位。在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了“纪律是执行路线的保证”的重大论断，把纪律放在最前面，作为决定党能否坚持革命、战胜敌人、争取胜利的首要条件。在党的各项纪律之中，政治纪律是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纪律，遵守党的政治纪律是遵守党的全部纪律的重要基础。

不断完善党内法规体系。我们党在这一时期不仅注重制定纲领性文件，以党内根本大法的形式在七大纲章中充分肯定了纪律建设的重要性；而且形成了专门性法规，实质上涵盖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等多重维度和财经纪律、宣传纪律等多个方面。不仅聚焦突出问题，克服党内存在的自由主义、分散主义，严明党的纪律、维护中央权威，推动全党统一意志、统一行动；还注重预防潜在问题，制度防线与思想防线相互促进。

党纪面前人人平等。无论是普通党员还是领导干部，在党的纪律面前都一律平等，遵守纪律没有特权，执行纪律没有例外，党内不准有不遵守纪律的“特殊人物”“特殊组织”。正如毛泽东所指出，“既使一般党员能

遵守纪律，又使一般党员能监督党的领袖人物也一起遵守纪律”。

党内监督和其他监督形式相结合。依托制度和党内法规开展党内监督，七大纲章再次专列“党的监督机关”一章，恢复了党的纪检监察有效制度。其他监督形式也在推动党的纪律建设中起到重要作用。这一时期，“三三制”政权中边区参议会的参议会监督、边区司法机关和检察机关的司法监督、《解放日报》等报刊的舆论监督以及毛泽东提出的“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的群众监督等多种监督形式形成合力，以党内监督为主导、多种监督形式贯通协同的监督体系建设独具特色、卓有成效。

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必须从严抓好党的纪律建设，把纪律建设摆在更加突出位置，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and 党中央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提供更加坚强的纪律保证。

提高政治站位，将“两个维护”作为纪律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深刻领会“两个确立”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最重要的政治成果，自觉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知行知止、令行禁止。坚持靶向施治，增强纪律约束力和制度执行力。纪律是管党治党的“戒尺”，纪律的生命力在于执行，要持续盯住“七个有之”问题，严教育、严管理、严监督、严制度、严责任，使得执纪必严、违纪必究成为常态。坚持系统思维，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推动思想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等贯通协同，思想建党、纪律强党、制度治党同向发力，推动各项措施在政策取向上相互配合、在实施过程中相互促进、在工作成效上相得益彰。注重常态长效，推动党纪学习教育在全党范围内走深走实。纪律教育只有常抓不懈、久久为功，才能统一思想、锤炼党性、凝聚人心。在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上下功夫见成效，做到学纪、知纪、明纪、守纪，让党员、干部受警醒、明底线、知敬畏，使铁的纪律转化为日常习惯和自觉遵循。



甘溪红军烈士纪念碑位于贵州省石阡县甘溪镇，始建于1966年，之后又进行了多次修缮和改建。纪念碑坐北朝南，高9.8米，分为塔基、塔座和塔身3个部分。塔身正面镌刻着萧克题写的“甘溪死难烈士永垂不朽”10个大字；塔基正面刻有《甘溪红军烈士纪念碑修建纪事》，简要讲述了纪念碑修建和修缮的目的和过程。塔座正面和左右两侧面都有刻字。其中，左右两侧面分别镌刻着老红军李真和陈靖为甘溪红军烈士纪念碑的题词，分别是：“黑夜茫茫盼天明，甘溪儿女念亲人。红军回到甘溪来，漫山鲜花夹路开。”“白虎山旁忆忠魂，满峰红叶血染成。重征人祭忠征人，九泉之下寄当今。新征途上奔马腾，应以硕果慰英灵。”塔座正面镌刻着《甘溪红军烈士纪念碑序》。全文如下（标点为引者所加）：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在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举行了震惊中外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一九三四年八月，红军第六军团辖17师49、50、51团，18师52、53、54团在中央代表、军政委员主任弼时，军团长肖（萧）克，军团政委王震等率领下，作为红军长征先遣队，从湖南寨前圩出发西征，冲破国民党湘、桂、黔敌军的围追堵截，于同年十月五日挺进石阡，准备经石阡到江口与红三军会合。

十月七日拂晓，红六军团前卫队刚刚到达甘溪，就遭遇数倍于己的湘、桂、黔敌军包围阻击。红军51团、49团1个营和红军学校学员即利用地形就地抗击敌人。掩护主力部队转移后，红军50团接替红军学校学员抗击任务，掩护51团、49团和红军学校学员转移。战斗中与主力部队失去联系的52团在师长龙云率领下，突围中与桂军激战3昼夜，弹尽粮绝，未能冲出敌人的包围，全部壮烈牺牲。龙云受伤被俘后，在长沙被军阀何健（键）杀害，留下了红军长征历史上著名的甘溪战役。红军主力突围后历经艰辛，转战于石阡、余庆、施秉之间崇山峻岭中，于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到达印江木黄与贺龙、关向应率领的红三军胜利会师。

二〇〇六年十月七日

碑文简要记述红六军团西征的过程，展现了红六军团在甘溪的浴血奋战，充分体现了红军战士坚定信念、顾全大局、不怕牺牲、英勇奋斗的精神，读之令人肃然起敬，催人奋进。

1934年4月，广昌失守后，中共中央决定进行战略转移。7月，中共中央书记处、中革军委向湘赣苏区发出训令，命令红六军团由湘赣苏区先行突围，深入湖南、调动敌人、摸清情况，在湘中开辟一块新的根据地，以策应中央红军战略转移至湘西根据地，与贺龙领导的红三军会合。接到中央电令后，红六军团积极进行转移的准备工作。8月7日下午3时，任弼时、萧克、王震率红六军团和红军学校共9758人，从江西遂川出发，突破敌人封锁线，开始西征。10月3日、4日，中革军委连续电令红六军团向江口前进，并与在印江的贺龙所领导的红三军相呼应。根据电令，红六军团从瓮安猴场改道向东北前进，分两路经龙溪进入石阡河坝场等地，准备经石阡县境进入江口地区。10月5日，红六军团进入石阡县境。

10月6日，红六军团前卫向甘溪进发，第二天继续东进，准备当日在甘溪休息，然后利用夜晚越过石镇大道进入江口。7日上午10时，红六军团前卫部队到达甘溪并与敌军遭遇。

西征路上的壮烈凯歌

——甘溪红军烈士纪念碑碑文敬读

□ 殷小娟 何兵兵

前卫红51团、49团1个营和红军学校学员利用地形就地抗击；红50团则迅速抢占了羊东坳高地，以掩护镇上的49团和51团。战斗十分激烈，而敌军还不断增援。军团首长认为，战斗从开始就处于被动地位，打下去无取胜把握，遂决定退出战斗向南转移，令红50团接替红军学校抗击任务，掩护军团主力转移。10月8日，红六军团主力进至包溪红庙，打退敌人追击后继续向南转移，在路腊遭遇敌人，经激战后摆脱敌人追击。9日，又在施秉大庆地区遭敌拦击，红50团被截断。

从甘溪遭遇战到大庆战斗，我军前后减员六、七百人，红六军团被截为3段，陷入了湘、桂、黔3省敌军24个团的包围之中。加之贵州多山，行军困难，伤、病员极多，情况十分危急。

为避敌锋芒，保存有生力量，军团首长决定各自分头突围去黔东根据地寻找贺龙领导的红三军。随后，红六军团主力在石阡余庆、施秉等地的高山密林中与敌人周旋。

其中，军团参谋长李达率领的红49团和红51团各一部分突围出石阡，经9天9夜艰苦转战，于10月15日在沿河县铅厂坝地区与红三军会合；红50团通过石镇大道，经平贵、平地场，于10月23日在江口县的苗旺与南来接应的红三军会合。其余红军军团主力在10月16日拂晓，从朱家坝出发转移，经过十几日的艰苦奋战，于24日抵达印江木黄，与红三军胜利会师。

突围中，为掩护红六军团主力转移，红18师52团800余人在师长龙云的率领下与追击之敌在板桥和大田激战，红军减员近半且与主力部队失去联系，后又在困牛山再陷湘、黔敌军和地方民团的重围。在困牛山战斗中，师长龙云率200余人冲破陡壁荆丛，顺河沟突围。但转战至叭叭龙颈坳一带时，龙云受伤被俘，最终英勇就义。其所率的红军战士，有的战死、有的失散，只有少数归队。断后的100多名红军战士在团长田海清的率领下继续战斗。到最后，100多名红军战士抱着宁死不误伤混杂在敌军中的老百姓、宁死不做俘虏的决心，从困牛山义无反顾地集体跳下数十米深的虎井沟。除个别红军战士被树藤挡住幸存外，大部壮烈牺牲。红18师52团“为革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红六军团从甘溪遭遇战到困牛山战斗，历时十几天，付出巨大牺牲，但依靠大无畏的精神和灵活机动的战术，终于分别成功突围与红三军胜利会师。

湖南汝城第一位女共产党员朱舜华

□ 李 宁 范永平



朱舜华，1902年出生，湖南汝城县人，是湖南省参加革命较早的先进分子和汝城县第一位女共产党员。朱舜华虽然是一位普通党员，但是她为投身革命，不惜与家人决裂，并发誓“革命不成，绝不回家”。在漫长的革命道路上，朱舜华经历了难以想象的磨难，付出了巨大牺牲，把一生献给了革命。

在长沙毛泽东家中加入中国共产党

朱舜华出生于地主家庭，生活富裕。在温室里长大的朱舜华却没有因此成为柔弱的花朵，反而成为反抗封建势力的先声。1917年，朱舜华考入湖南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在这里朱舜华与进步学生何宝珍等朝夕相处，不仅阅读了许多革命书刊，还积极参加各类社会活动，思想日趋进步。1919年，17岁的朱舜华参加五四运动，结识了毛泽东、刘少奇、杨开慧等人，加入了新民学会。1920年7月，她参加赴衡阳的驱张（敬尧）代表团，随何叔衡等到郴州宣传时回到汝城。分别在储能学校、濂溪学校、云头书院组织发动师生及爱国人士等集会，宣传马克思主义，向濂溪学校学生介绍《新青年》等进步书籍，号

召大家行动起来，“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坚决抵制洋货”，启发和带动了一大批进步青年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投身反帝爱国的革命洪流。父亲认为其大逆不道，百般阻挠，并以断绝经济相威胁。朱舜华公开宣称，“我不稀罕荣华富贵，对自己选择的道路决不后悔”，从此脱离了封建家庭，走上了革命道路。

1922年5月，毛泽东来到衡阳，在湘南学联参加了五一节纪念会，并作讲演。朱舜华和何宝珍专门跑去听了五一节纪念会的演讲，“感到很新鲜，听得津津有味”。不久，朱舜华就同何宝珍、邓金声、肖腾芳4人跟毛泽东一道去了长沙。朱舜华和何宝珍同住清水塘，与毛泽东和杨开慧住在一起。从此，毛泽东和杨开慧就成为他们的朋友兼老师。这一时期，朱舜华在毛泽东和杨开慧的耳濡目染之下，不断进步，逐渐成长为坚定的革命者。1922年10月，在长沙清水塘毛泽东家中，经刘少奇、杨开慧介绍朱舜华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毛泽东语重心长地对她说：“干革命不容易，要吃得起千辛万苦，你受得住就干下去，受不住就回你家那个大花园去。”朱舜华坚定地回答：“要是受不住，我就不跑出来了。”

为了革命多次经历丧子之痛

1923年3月，朱舜华与丈夫贺恕被毛泽东派往水口山矿开展革命工作。11月，在庆祝水口山工人俱乐部

成立一周年之际，她被动派逮捕。敌人逼迫她交出党团员和俱乐部负责人名单，朱舜华坚贞不屈，遭受酷刑，奄奄一息，腹中胎儿被踢死，后被工人们冒死救出，被抬到耿飚家中，后又转移到离矿比较远的老工人家里，并请了医生抢救才得以活命。耿飚后来在回忆录中提及此事。

马日事变后，朱舜华和贺恕在衡阳北乡庙溪山一带领导农民武装斗争，两个孩子则被留在了城内。敌人多次抓她未果，便抓住了两个孩子，并以此来要挟朱舜华投降。敌人将她年仅3岁的儿子残忍杀害。女儿被奶妈抱走，从此失去了音讯。

1927年12月，中共湖南省委派朱舜华和贺恕到宝庆（今邵阳）工作。贺恕任湘西南特委书记，她担任中共湘中区委组织部长，他们一同在宝庆、洪江一带组织游击队开展武装斗争。1929年5月，她下山生孩子。7月，敌人包围村庄逮捕了她。敌人对她严刑拷打，她被折磨得多次昏死，仍宁死不屈。幼儿也惨遭杀害，朱舜华悲痛欲绝，昏死过去，被敌人抛尸荒野。深夜，农民前来收尸，发现她气息尚存，把她背回去救活了。

1930年2月，朱舜华同丈夫带着仅有的一个女儿去寻找党组织，途中因遭遇敌人追捕，情急之中只得把孩子托付给他人抚养。她与丈夫沿途乞讨，终于在上海找到了党组织。但他们最后的这个孩子，始终没有找到。为了革命，朱舜华和贺恕夫妇失去了全部的5个孩子。

5月，朱舜华在上海担任中共中

央组织部联络员。她边到工厂当女工维持生活，边积极投入工人运动。那时生活异常艰难，有时连稀饭也喝不上。刘少奇曾脱下身上的皮袄到当铺当钱，帮助朱舜华夫妇维持生活。

向毛泽东表示“仍愿做一名小学教师”

新中国成立后，朱舜华任上海市教育工会秘书。一次赴京参观学习，毛泽东得知后，将她接到中南海叙谈，合影留念。分别时，毛泽东关切地问：“你愿意做什么工作？”她说：“三十年来，我是教书的，现在我愿做一名小学教师。”她婉拒了毛泽东、刘少奇等人留她在北京工作的好意，回上海继续从事教育事业。她的名言是“所有的孩子都可爱”。朱舜华一生没有存款，余钱大都用来接济贫困学生。家里除了刘少奇送的一件棉袄、柳亚子送的一对沙发外，其他都是缝缝补补的衣帽鞋袜等生活必需品。尽管如此，她却把自己3000余元补发工资全部捐作了党费。晚年的朱舜华抱病撰写了《把一切献给革命》《清水塘的亲切教诲》等一系列革命回忆录，为编写革命史、烈士传提供素材，经常应邀为青少年讲革命传统故事。

1981年9月28日，弥留之际，朱舜华欣慰地对守护她的干部说：“我不为名利，一生交给革命……我心里高兴。”朱舜华的一生，充满了坎坷和磨难，但她始终保持着对革命事业的热爱和信念。

为了新中国 ——革命烈士纪念碑碑文敬读

